



改革水价



作者: [大卫·利普顿](#)

2016年3月22日

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首先学到的经济学知识之一便是**钻石与水的悖论**。为什么生命必不可少的水是免费，而对生命存在无关痛痒的钻石却价格昂贵？

答案是如果水的供应远大于需求，那么水就可以是免费的。尽管全世界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对水的需求仍然超过了供应。这一失衡最清楚地表明水价被低估了。但是，许多政府却不愿意像其他商品那样去为水资源定价。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这样做是否是正确的选择。通过提供便宜的水资源，政府能否成功保护其公民？在“世界节水日”这天，让我们来仔细研究这一问题。

价格激励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定价水资源，那么最终导致的便是当前和未来的水资源分配不当。当前水资源分配不当的表现是水的浪费、农业生产率低下，或者更糟的是卫生条件恶劣、疾病和营养不良。未来分配不当的表现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满足未来水资源需求和确保用水安全的技术缺乏。

如对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不予以重视，将可能导致各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增长表现不佳。从世界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正确定价”非常必要。例如，在印度，对水资源和相关投入的价格低估导致当前出现水资源匮乏以及难以解决的长期问题。通过降低柴油价格和为灌溉水泵免费提供电等与水资源相关的补贴，已经导致大范围的地下含水层过度开采以及土壤碱化加重，几乎导致上世纪 60 年代“绿色革命”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成果付之东流。

再比如，加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在 2014 年年中发布了一项行政令，要求接下来 12 个月的用水量较 2013 年的水平减少 25%。加州出现严重的水短缺问题有许多原因，包括严重的干旱和史无前例的高温，但几十年来对水资源的错误定价也是原因之一。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价格激励在合理利用水资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可以说明对水资源的错误定价会导致所谓的“公地悲剧”，即个体的资源利用者根据个人利益独自、理性地利用资源，而结果却是资源耗竭，有悖于所有资源利用者的共同利益。地下含水层的迅速消耗和水质的恶化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冰山一角

许多国家的供水公司对家庭收取的水费仅是供水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更不用说有资金去维护或者扩展水利设施了。

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在2012年，水价低估导致全球的水资源补贴总计约456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6%。一些国家的补贴甚至达到其GDP的5%。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这些估计数不包括农业用水，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用水占到整个水资源消耗的绝大部分。

一些国家的水资源补贴甚至超过公共投资开支总额（见图1），这表明其他值得开销的支出被挤出。

如果不收取水费能惠及穷人，那么水资源补贴这一说法还站得住脚。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水资源补贴并不公平，没有实现政府宣称的目标。

既然一个人得到的补贴与其用水量成正比，而且穷人通常用水有限或者根本没水可用，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水资源补贴最终惠及的主要就是高收入群体。在部分低收入经济体，当最贫穷家庭每得到1美元的补贴用水时，最富裕家庭平均能得到3美元的补贴用水（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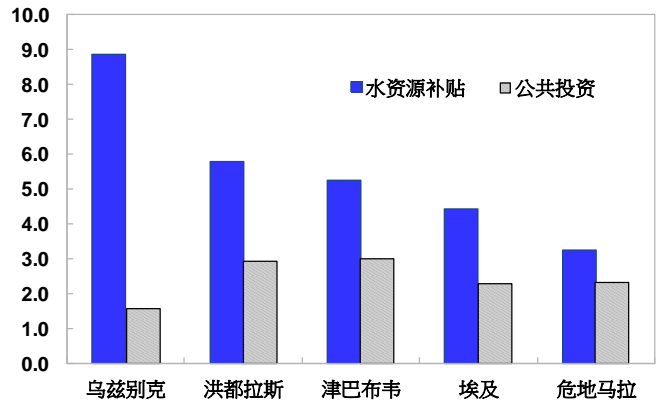
正确定价，节约用水

因此，答案何在？实现用水效率的提高需要一整套方法，并以能直接或间接推动用水政策的改革相补充。政府可以制定法规，加强用水权利和提高用水效率，建立强有力且独立的机构负责水资源管理，以及举办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为这些改革提供支持。

供水定价改革应该成为改善水资源管理措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实现需求合理化，改进供水方式，还能释放更多供给。政府对水资源的定价方式必须要能收回所有成本，包括维护和投资的成本，还应该能向更多的穷人和脆弱群体供应用水。

图1
水资源补贴和公共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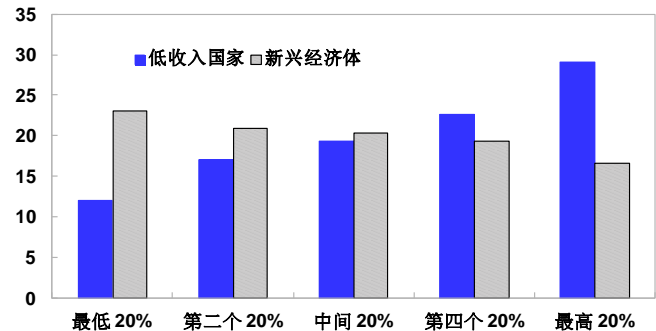
(占GDP的百分比，2012年)



来源：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工作人员的计算。

图2
按收入国家组划分的水资源补贴分布

(占补贴总额的百分比)



来源：Komives 及他人（2005）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低收入国家组包括佛得角、尼泊尔和尼加拉瓜。新兴市场经济体组包括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印度、巴拿马、巴拉圭和委内瑞拉。

以布基纳法索为例。该国根据用水量，针对饮用水实施了一套累进的收费表，用水量更多的用户群补贴用水量最少的用户群并开展卫生活动。供水公司实现了 97% 的成本回收率，负债率低，而且实现了年利润。由于推行了供水定价改革，过去 20 年该国的饮用水供应覆盖面翻了一番，这对于水资源匮乏、降雨量极为不均衡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基金组织为何关注这一问题？很明显，水资源的挑战有经济影响，如不能管理好水资源问题，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希望能从经济角度研究该问题，可以对这一重要问题提供更多分析。正如加州的水资源困境告诉我们，推迟行动的代价无人能承担。

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水信息图](#)以及《金融与发展》的[文章](#)。

大卫·利普顿于 2011 年 9 月 1 日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在此之前，自 2011 年 7 月 26 日开始，大卫·利普顿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特别顾问。

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利普顿先生曾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管。

之前，利普顿先生担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兼全球国家风险管理总裁。其间，他主持了花旗国家风险委员会的工作，为高级风险官提供协助，就全球风险问题向高级管理层提供建议。2005 年 5 月加入花旗之前，利普顿曾在全球对冲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工作五年。在此之前，他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工作一年。

1993 年至 1998 年，利普顿先生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政部工作。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期间，利普顿先生在财政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供职于克林顿政府之前，利普顿曾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研究员。

1989 年至 1992 年，利普顿先生与当时的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合作，担任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俄罗斯、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政府的经济顾问。

利普顿先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在基金组织工作了八年，从事与新兴市场和贫穷国家经济稳定问题相关的工作。1982 年，利普顿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和硕士学位，1975 年获得卫斯理大学学士学位。